

B 白城记忆

清朝时期的白城——

蒙古科尔沁部封地

●宋德辉

1636年3月,漠南蒙古科尔沁等16部49个台吉齐聚盛京沈阳,一致称皇太极为“博格达彻辰汗”,意为“宽温仁圣皇帝”,承认皇太极为蒙古大汗正统的继承者,是自己的君主。皇太极接受尊号,在盛京即皇帝位,建国号“大清”,改元崇德。

漠南蒙古16部的臣服,是满蒙关系史上的一个转折点,标志着从此蒙古各部从后金的盟友关系转为清朝的臣属关系,其平等地位转变为从属地位。这是努尔哈齐及继承者从明万历二十二年(1594年)蒙古科尔沁部遣使归附后金,到后金天聪九年(1636年)蒙古察哈尔部降附后金,经过40多年和平、军事的手段所取得重大胜利。

此时的皇太极十分清楚,蒙古16部的臣服,使清政权彻底消除了进攻明朝、入主中原的后顾之忧。然而皇太极和他的谋士们深深地懂得,仅靠联姻和盟誓,取得对蒙古部族的统治和驾驭是远远不够的。摆在清初统治者面前的是如何长久地统治这些降服的蒙古诸部,使蒙古铁骑成为清朝入关征明、保卫北部边疆的重要武装力量。清初的统治者在总结了历代中原王朝统治北方民族的经验教训,尤其是辽、金、元时期契丹、女真、蒙古等民族建立王朝后对其他民族统治的经验教训,根据当时社会现实和蒙古民族的具体情况制定和推行了一整套统治蒙古的制度和政策。

设蒙古八旗。把在清初满洲族进行统一战争中俘获到的蒙古战俘和部分自愿或被迫归附的蒙古人组织起来,于1635年建立蒙古八旗。八旗蒙古和八旗满洲及八旗汉军一样,部分驻守京都,称京旗或禁旅八旗,部分驻扎各地,称驻防八旗。所有八旗都隶属京师的八旗都统衙门。每旗的最高首领为都统,八旗的最高统帅是清朝皇帝,使他们从蒙古部族中划分出来。

划分内属蒙古和外藩蒙古,剥夺内属蒙古的世袭权利地位。内属蒙古由清朝政府任命的蒙古王公进行统治,各级官员完全是流官,可随时任职或

撤换。内属蒙古的土地和属民由清政府直接管辖,和汉族地区的州县一样。内属蒙古和八旗蒙古有相似之处,即都不存在王公制度和领主制度,取消了部分蒙古贵族的世袭地位。

实行盟旗制。对外藩蒙古实行盟旗制度,削弱蒙古部族势力。清政府在招抚和征服蒙古各部后,对原有的政治制度进行了整顿,取消了蒙古原有的兀鲁思(领地)、土绵(万户)和鄂托克(部落)的区分,在重新调整或划分牧场的基础上,实行新的盟旗制度。对于蒙古原有的部,清朝或者编为一旗,或分为数旗。旗是最基本的军事行政组织,具有两重性,一方面是清朝政府的行政单位,另一方面又是蒙古王公的世袭领地。旗设札萨克(旗长),掌管本旗事务,又称札萨克旗。札萨克同旗一样,也具有两重性,一方面是清朝的地方官吏,一方面又是世袭的领主。札萨克旗的承袭或贬黜以及爵位的升降和承袭,完全掌握在清朝政府手里。按照这种定制,旗与旗之间互不统属,谁也不管着谁,旗直接对中央负责。盟又只是一个会盟的组织者,对下没有管辖权。这就从根本上削弱了原蒙古部族的势力,使其无力再进行规模较大的联合反叛行动,过大的权力得到了有效的扼制。清朝政府划定各旗的界线和管辖范围外,对各旗统治者制定了许多禁令。“正其疆界,悉遵约事”,这就消除了因争夺牧场和属民而发生的纠纷或战乱,一劳永逸地结束了从十四世纪以来蒙古地区的割据和混乱局面,有利于蒙古社会秩序的安定,有利于生产力的发展和人口增长。这是清朝的一个重要历史贡献。

实行封爵制度,笼络蒙古贵族。为了笼络骁勇善战的蒙古人,利用蒙古骑兵无往不胜的战斗力,清朝统治者给予蒙古封建主超越汉人而仅次于满人的政治地位。顺治十三年(1656年),顺治皇帝在召见科尔沁蒙古王公时向其保证:“朕世世为天子,尔等亦世世为王,享富贵于无穷,垂芳于永远。”清代对蒙古王公的封爵制度,采用清朝宗室的封爵

制度。主要在外藩蒙古中实行。根据蒙古王公原来的地位、功劳的大小,尤其是对清朝的效忠与否则,分别赐予亲王、郡王、贝勒、贝子、镇国公、辅国公、台吉、塔布囊(在成吉思汗家庭封台吉,异姓功臣后裔封塔布囊)等,获得不同爵位的王公贵族构成了贵族阶层,“科尔沁六旗有王四、郡王三、贝勒三、贝子一、镇国公一、辅国公五”。至于台吉其数之多,几乎无法统计。道光十年(1830年),仅科尔沁右翼中旗就有台吉2000人,而全旗只有22佐领,“百五十丁编一佐领”,贵族人数与平民相差无几。

科尔沁部编为六旗,据内蒙古自治区《兴安盟志》记载,清崇德元年(1636年),始建科尔沁右翼前旗(札萨克图郡王旗)、科尔沁右翼中旗(图什业图亲王旗)、科尔沁右翼后旗(镇国公旗),属哲里木盟,直隶于清朝中央理藩院。清顺治五年(1648年),扎赉特部改置为扎赉特旗,归属哲里木盟,直隶于清朝中央理藩院。

今天白城市5个县(市、区)中的通榆大部分、洮南、洮北区属于科右前旗札萨克图郡王旗领地,通榆县原瞻榆县部分属科右中旗图什业图亲王旗领地。大安市属科右后旗领地,位于大安市新艾里乡的陵界墓地,就是科右后旗即镇国公旗的家族墓地。第五任札萨克镇国公喇嘛札布在巡视所辖疆土后,认为这里是一处难得的“风水宝地”,遂将其“龙头”所在地的新艾里所在地选定为墓地。喇嘛札布于乾隆十九年(1754年)卒后,始葬于此。其后的第六、第七直至第十三次袭,共九代札萨克镇国公的陵墓均葬于此,成为科尔沁右翼后旗札萨克镇国公的家族墓地,当地民众称“公爷陵”或“陵界”。镇赉县属扎赉特旗。

除科尔沁六旗,即科尔沁右翼中旗、前旗、后旗,科尔沁左翼中旗、前旗、后旗外,还有扎赉特旗、郭尔罗斯前旗、郭尔罗斯后旗以及杜尔伯特旗,属科尔沁部,由哲里木盟统属。(三十)



清代龙纹瓷盘



清代粉彩瓷盘



清代景泰蓝瓶

●“不一则不专,不专则不能”。让我们多一些专心致志,少一些心浮气躁;多一些持之以恒,少一些朝三暮四;多一些善始善终,少一些虎头蛇尾。

古人治学,常常因心无旁骛,而有诸多“痴”“醉”之举。据《北齐书》记载,南北朝时期天文学家信都芳以研习算术、天文为乐,常对人说:“算历玄妙,机巧精微,我每一沈思,不闻雷霆之声也。”另据《东坡全集》记载,唐朝书法家欧阳询曾经骑马赶路,见路旁一古碑为晋朝著名书法家索靖所题,旋即下马观看,许久才舍得离去。走离不远,又折返回来,继续下马观察,“及疲,乃布裘坐观,因宿其旁,三日方去。”二人用心之专,由此可见一斑。

所谓“痴”“醉”之举,并非愚钝笨拙,实为用心专注,不顾其余,如痴如醉罢了。古往今来,大凡有所成就者,都绝不可能是三心二意、朝秦暮楚之辈,大多是用心专一、矢志前行之士。缘何?一分耕耘一分收获,春华秋实,这些是亘古不变的真理。清朝纪昀在《阅微草堂笔记》中云:“天下未有心不在事而是事能指极者,亦未有心不在事而是事不指极者,心在一艺,其艺必工;心在一职,其职必举。”其言,阐述的也是“时间精力在哪里,成就收获就在哪里”的道理。

“守少则固,力专则强。”用心一者,寡欲静心,方可沉潜于事。《庄子·达生》记载有一则“粘蝉”的故事,孔子在路上见到林中有老人以竹竿粘蝉,技艺娴熟令人叹为观止。孔子询问其中的门道,老者说自己在捕蝉时站得像树桩一样,视拿着竹竿的手臂为枯枝,虽天地之大、万物之多,“吾不反不侧,不以万物易蜩之翼,何为而不得!”此之可谓用心于一也。著名医药学家李时珍,自1565年起,先后到庐山、茅山以及安徽、河南、河北等地收集药物标本和处方,并拜渔人、樵夫、农民、药工等为师傅,考古证今,历经27个寒暑,三易其稿,方完成鸿篇巨制《本草纲目》。此之可谓用心于一也。

用心一时也好,用心一世也罢,考验的都是钻研的功夫、坚韧的定力。在庆祝改革开放40周年大会上受到表彰的“改革先锋”“中国天眼”的主要发起者和奠基人南仁东,23年如一日,从壮年走到暮年,建成世界最大单口径球面射电望远镜,硬是凭借一股子专注的劲头,将朴素的想法变成国之重器。“守岛卫士”王继才,在远离大陆的开山岛上,坚守着“直到守不动的那一天”的上岛誓言,32年、11600多个日日夜夜,让五星红旗每天冉冉升起,直至生命最后一刻。毋庸置议,他们都是用心专一、事有所成的典范。

反之,“欲多则心散,心散则志衰,志衰则思不达也”。面对世间林林总总的选择和形形色色的诱惑,有的人一味求权势、慕虚名,却对业务提升浅尝辄止,不愿深钻细研,不愿努力;有的人虽然时常感受到“本领恐慌”的压力,常立志却无恒心,学了也学了,屡“掘井”却从未“及泉”;更有甚者,片面求速成、速效,在学问、业务上抄袭剽窃、弄虚作假,最终毁了自己的名声。

王国维在《人间词话》中说,古今之成大事业、大学问者,必经三种境界:第一境界是“昨夜西风凋碧树。独上高楼,望尽天涯路”;第二境界是“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第三境界是“众里寻他千百度。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这三种境界,也分别对应了“苦索”“愚想”“顿悟”三个阶段。无论治学抑或立业,绝无一蹴而就,一步登天之理,必当专心笃志、久久为功,多下一些“痴”“醉”功夫,方可积跬步而至千里,从量变达到质变。

“不一则不专,不专则不能”。让我们多一些专心致志,少一些心浮气躁;多一些持之以恒,少一些朝三暮四;多一些善始善终,少一些虎头蛇尾。

成语故事



冰壶秋月

冰壶秋月:盛水的玉壶,中秋的月亮,比喻品格高尚。出自宋代苏轼《赠潘谷》:“布衫漆黑手如龟,未害冰壶贮秋月。”潘谷,宋元祐歙县人,一生制墨,品质优良,人称“潘谷墨”。苏轼写《赠潘谷》,表达了对潘谷品格和技艺的崇敬。蒋振兴 陈长松/图文

诗词鉴赏

四时田园杂兴

●[宋]范成大

梅子金黄杏子肥,麦花雪白菜花稀。日长篱落无人过,惟有蜻蜓蛱蝶飞。

赏析

如果说张择端的《清明上河图》是北宋都城汴梁繁华都市景象的长卷,那么范成大的《四时田园杂兴》组诗则可以看作南宋乡村田园生活的长卷,只不过是语言描绘的。这组诗创作于范成大退居家乡之后,共六十首,分为春日、晚春、夏日、秋日、冬日五个章节,每个章节有12首诗。这里选的是《夏日田园杂兴》的第一首。

所谓“杂兴”,即有感而发、随时吟咏,以此为题材的诗篇,往往善于撷取生活中富有意味和美感的画面,从中发现诗意,探源寻义。《四时田园杂兴》中的诗歌均是如此,诗人带着善于寻找美的眼睛,游走在乡间四时之中,如一台摄影机,将引入眼帘的画面,通过恰当的构图和修饰,纳入镜头,遂为我们留下经典的画面。

这首诗词描绘的是江南夏日的景象。初夏时节,梅子金黄,杏子虽未成熟,也已越长越大,饱满水灵——这是树上景色。再看田园中,一望平畴,荞麦花雪白,铺满大地,金黄的菜花已然开过,稀稀落落,遍地金黄不再。这两句诗,色彩鲜艳明媚,梅子和菜花的金黄、杏子的青涩、荞麦花的白色,再加上可以想见的树叶的深碧、麦苗的青葱,好一幅美丽的水粉画。除了色彩,亦能看见形体,杏子的饱满,荞麦花的轻柔,油菜花落后茎叶的粗壮,都历历如在目前。

此时,天时光长,农事渐忙,农人都在田中做活儿,院前篱笆边上,杳无人迹,唯有蜻蜓和蝴蝶飞来舞去,仿佛它们才是世界的主宰。这两句描绘初夏村落的寂静景象,侧面写出农人的辛劳。但诗中虽曰无人,却也并非真的无人在,诗人隐匿于诸种景物中,不动声色,旁观细描,与环境融合无间,充分体现出诗人对田园的热爱。(雨果)

中国古代科学发现之十三

天象记录

●王玉民

天象,泛指各种天文现象,如天体出没、月球盈亏、日月食、行星冲合、流星闪电、彗星隐现、新星爆发、陨星坠落等。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天人合一”观念,强调“天道”与“人道”、“自然”与“人事”的相通,所以中国古代对天空中出现的各种天象非常重视。近代以前,中国人一直是世界上最勤勉、最精确的天文观测者。历朝历代,皇家天文台都有专职人员日夜不停地观天测候,几乎不漏掉任何突发天象,为后人留下了丰富的天象记录,这些天象记录被视为全人类珍贵的科学遗产。

中国古代的天象记录中,最有价值的是涉及日月食、彗星、太阳黑子、新星等的资料。史书中彗星、流星、新星等记录的详细程度和精确程度,可使现代人根据这些记录精确地确定其位置、亮度和运动变化过程,很多记录对现代天文学研究也有很高的应用价值。日食记录最突出的应用是研究地球自转速度的变

化。利用现代推算的某次日食同历史上这次日食的实际观测数据比较,可以得出可靠的地球自转长期变化情况。历史拥有的可靠日食记录主要来自中国,中国有的日食记录已成为经典,如《尚书》中记载的日食被称作“书经日食”,《诗经》记载的日食被称作“诗经日食”等。

中国历史上有1000多次彗星记录,最早的见于《春秋》鲁文公十四年(公元前613年)“秋七月,有星孛于北斗”,而且已经把彗星看作是天体了。相比之下,西方从亚里士多德开始直到16世纪一直把彗星看作大气中的燃烧现象。

《汉书·五行志》记载了公元前28年的太阳黑子:“三月己未,日出黄,有黑气,大如钱,居日中央。”时间、位置、大小俱全,而西方直到伽利略利用望远镜才真正确认了黑子的存在。自商代到17世纪末,中国史料上记载了90多颗新

星、超新星事件,是世界上非常珍贵的天象记录。20世纪50年代,中国天文学家史家席泽宗整理发表的《古新星新表》,详尽考查了这些记录,为那时射电天文学的一系列重大发现提供了有力的历史材料,为现代恒星演化理论做了非常重要的印证,在国际天文学界引起了轰动。这是中国古代天象记录应用最精彩的篇章,被誉为20世纪中国人对世界天文学的最大贡献。

